

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 孙 伟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①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

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违，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②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

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分得了土地。苏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老百姓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为革命凝聚了巨大力量。“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被群众称为“流动的苏维埃”。在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群众依然想方设法掩护和支援便衣队。白天外出劳动时，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

期。徐向前在回忆大别山革命斗争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党和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大别山党和军民面对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始终能够保持自立自强、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黄麻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决定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后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在游击战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军事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比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大别山实行土地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等政策的建议。毛泽东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别山党和军民从当地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探索新的规律和方法，坚持长期斗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展现了大别山区军民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和革命智慧，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坚实保证。

新民学会对建党的贡献

□ 宋克祥

1918年4月，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导下，新民学会在长沙湘江之畔蔡和森寓所成立。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历经国内外探索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人才基础和斗争实践基础，作出了贡献。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

作为一个学术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初创时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各种思想问题和国内外形势，探讨中国的去向问题。已到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传来留法勤工俭学招生的消息，开启了新民学会会员赴京筹款勤工俭学、接触进步新思想、踏上人生新路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主张人才应散于世界各地去考察，不应堆积于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了解当时世界最进步思想学说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萧子升带领19名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毛泽东等则坚持留在国内，研究和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从事实进行改造”。

蔡和森在法勤工俭学期间，用执着精神阅读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及时向国内毛泽东、陈独秀写信，系统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9月16日的来信中重申“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明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介绍了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组

织机构和建党步骤。他是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和建党理论的人。

毛泽东等人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实现人生观、世界观转变，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一封信中指出：“固然要有一批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信中则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支持蔡和森提出的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的主张，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7月，赴法留学骨干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新的方针，并就如何实现进行了讨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革命、组织共产党。1921年1月初，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和目的，从而实现了一个学术团体向革命团体的转变，这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下决心“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从1915年9月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喂鸣求友开始，经过广泛交際，“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凝聚了一批心忧天下、目光远大、意志坚定、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毛泽东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

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学会标新立异，除旧布新，充溢着求知欲和开放气息，会员从发起时的十几人发展到70多人，凝聚和影响了一大批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分子，特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坚定革命信仰的共产党人，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了人才基础。学会的78名会员，其中有37名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卓越的领导人和精英。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0名新民学会会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数最多的进步团体，在党还很弱小的时候投身革命，成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道路的中坚力量。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新民学会成立后，先后组织湘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发动长沙五四反帝游行示威，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湖南省自治运动。在以上这些斗争和实践中，会员不断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长为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外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夏明翰、蒋先云在衡阳，邓中夏、蔡和森等在北京，黄爱等在天津，田汉在日本参与到这场为争取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中。7月14日，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大声呼

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评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倡导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主张“民众的大联合”，指出人民群众运动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国家坏到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民众大联合的策略成为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即统一战线。许多青年如任弼时、萧菊光、郭亮、夏明翰就是受《湘江评论》影响开始了革命的觉悟、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的。

随着广大知识青年和各阶级人民开始觉醒，湖南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起草罢课宣言，长沙几十所学校13000多名学生罢课，张敬尧下令秘捕毛泽东未成，反而激起毛泽东组织庞大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武汉、上海、广州请愿。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等指导启发下，利用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逼走了张敬尧，驱张运动胜利了。

随着许多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新民学会停止活动。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即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新民学会解散了，但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的基础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得到加强和发扬，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也被传承下来。



叶剑英是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十大元帅之一。在党和国家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叶剑英总是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出生于1897年，逝世于1986年，享年89岁，可谓历经磨难，但依然长寿，这与他热爱中医，毕生对中医药情有独钟有很大关系。

如果不搞军事就可能学中医

医者救死扶伤、精诚济世的医德让老百姓尊敬。叶剑英之女凌孜（原名叶向真）回忆说：“父亲曾经说过他若是学了医，一定是个好医生。我相信这话。有时，我真觉得他应该当医生，而且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名医。”

叶剑英的故乡在广东梅县，中医药在广东百姓中有深厚的基础。叶剑英在中学读书时就十分喜爱中医方面的书籍，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参加革命后，也对中医药留意关注。他还经常用中草药为自己、亲人和部属治病。

“父亲喜欢给身边的人推荐看中医，还常常自己开方。”一次，叶剑英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听说凌孜在北京患了鼻窦炎，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积累，专门在广东挖了一些“鹅不食草”的秧苗，种在两个花盆里，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哪知道女儿患的不是鼻窦炎，而是一般的过敏性鼻炎。虽然不对症，但父亲的细心关爱让凌孜感动不已。

上世纪50年代，叶剑英在武汉出差的时候，看到有中医大夫在筷子上用线捆扎一簇针进行治疗，当地称为梅花针，疗效很好。他非常感兴趣，回到北京后，很快推荐给卫生部，让它在全国推广，后来进行改良，变成了现在这种塑料柄的梅花针，广泛应用于临床。

有一次，叶剑英住在长沙市芙蓉宾馆。当时，宾馆的一个炊事员的妻子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叶剑英知道后，亲自为这位炊事员的妻子开处方、采药，很快就治愈了。

而叶剑英自己也多次受益于中医药。凌孜听父亲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患肠炎，住进一家法国医院，好几天不见好，腹泻得快虚脱了。后来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个中药方子，托朋友给煮了一暖壶，其中有菊花、金银花、甘草等药，还加入了蜂蜜。一暖壶药喝下去，父亲的腹泻就基本止住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1970年，叶剑英在湖南患了肺病，经过治疗有好转，但还是咳嗽。后来，住地所在的部队医院听说叶帅钟情中医，便请了一位老中医，用“矮地草”等草药，治愈了咳嗽。叶剑英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中药很重要，长征时没有西医和西药，就全靠中药治病。我自己有个小本本，记有好多重要偏方，如果不搞军事，我就可能学中医当医生了。”

践行中医文化

中医是中华民族祖先世代代传下来的，它内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953年12月，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叶剑英对毛泽东这个观点感同身受，而且在自己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积极践行中医文化。

叶剑英认为，善为医者，不仅仅是能治病救人，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他一直坚信，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是治人的，而不仅仅是看“病”。把握了医道的精髓，既可以去治人，也可以去治国。因此，不管遇到什么环境，叶剑英总是表现得沉着冷静，应付自如。

叶剑英在教育子女时，也常用这些理。孩子在遇到挫折时，他告诉他们，要相信乌云不会长久，要镇静坚定；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最后总是要达到平衡的。中国人强调一个“中”，就是要把握一个分寸，把握一个度，但是这个度不是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的。

1959年1月，他在全军科学研

叶剑英钟情中医药

□ 罗元生

究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说，“整理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经验，要用科学的方法。要注意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接着，他以李时珍上山采药写出《本草纲目》为例，强调要以“上山采药”的精神深入到连队的士兵群众、下级干部中去收集资料，把“药”采全，用“药”要真，这样才能保证疗效。可见他对中医之道的运用。

关注中医药发展

叶剑英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尤其关注中医药的发展。他还专门为1960年出版的《中药简史》一书写了序言。

他在序言中说：“这几年，我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员，病中深深感觉，对一种病症，采取中西并用、内外夹击的方法，不失为我国医药界最新、因而也是最进步的方法。中医必须学通西医，西医必须学通中医，才算是名医。中医、中药，在中国人民中，数千年来流传着。可是，中医、中药近百年来，在学术界被压抑着，这分明是‘数典忘祖’的谬误了。将中医和中药药材知识加以科学的整理，把中药知识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是青年一代医师们的庄严工作。作为一个病人，我十分关怀中国中药的发展与成就。”

著名中医蒲辅周老先生曾到中南海为周恩来等多位领导人看过病，也去过叶剑英家。叶剑英对蒲老很是尊敬，对其医术非常佩服。他经常称赞，“蒲老用药独特，怎么开两三毛钱的中药就给治好了！”

晚年，叶剑英多次强调要中西医结合。在住院期间，还与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讲过这样一个例子：苏鸿熙教授在给一位二尖瓣狭窄病人进行手术后，病人出现肺炎，高烧数日不退，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抗生素，也不见效，最后高烧昏迷，这让我国第一位留美回国的心外科专家束手无策。后来，请来了老中医叶心清。叶心清1908年生于四川大邑，13岁从师于汉口名医魏庭兰，1933年到重庆筹组国粹医馆行医20余载，1955年调入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曾给很多来华的外国元首看过病，医道精深，经验丰富。他开了汤药给病人服用，同时配合针灸，三服药下去，病人烧退，肺部炎症也得到了控制。

叶剑英一直认为中医理论是科学有据、合乎情理的。比如他讲到，中医讲的“性命”，性为思维意识，即七情六欲；命是生命体征、身体状况。中医认为人是由身体和意识共同构成，所以讲七情六欲能致病，也可以通过调节情志来治病，还能通过五脏与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诊治。这些理论都是非常科学的。

